

隐蔽战线
春秋书系·传记卷

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

穆欣◎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 丛书前言 ||

章百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既有公开战场的博弈，又有隐蔽战线的较量。公开战场和隐蔽战线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相得益彰，奏响了中国革命的一曲曲凯歌。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要战胜敌人必须打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战争，一种是隐蔽战争。隐蔽战争有战略进攻，派人打入敌人的内心；也有战略防御，保卫自己。要打败敌人须内外夹攻，所以两者都有同样的意义。

党的隐蔽战线随着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党的壮大而壮大。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危急关头，周恩来领导创建了党的第一个专门情报保卫机构——中央特科，培养和造就了一批隐蔽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和业务骨干，为保卫党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作出了特殊贡献。中央苏区时期，在中央和各主要苏区创立的政治保卫工作，对配合苏区工农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发展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纯洁红军队伍作出了特殊贡献。长征途中，红军情报侦察部门及时获取敌人往来的电报，使中央指挥机关能够及时了解敌人的军事行动部署，避实就虚，屡出奇兵，摆脱围追堵截，胜利实现了伟大战略转移。红军到达陕北后，在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过程中，隐蔽战线发挥了关键作用。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先后成立了中央社会部和中央情报部，隐蔽战线斗争进入了专业化的成熟期。我情工人员深入日伪党政机构，获取了日伪大量军政战略情报和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情报，对配合抗日战争

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解放战争时期，我党我军的情报保卫工作得到了更加深入广泛的发展。我情工人员深入到国民党机密决策指挥机关内，及时准确地供给了党中央和军委及各地区战略性和动向性的重要军政情报，为中央制定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提供了重要依据，使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对敌人的主要情况了如指掌，始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毛泽东评价这个时期“我们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艰苦卓绝的隐蔽战线斗争造就了一大批无名英雄。他们有的大智大勇，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有的深入虎穴，与敌周旋，获取情报；有的舍生取义，面对严刑，视死如归；有的潜伏敌营，长期经营，率部起义；有的忠诚可靠，周密安排，确保党中央安全；有的巧妙应对，冲破封锁，保证交通线畅通。一代代无名英雄赤胆忠心，赴汤蹈火，用忠诚与信仰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无名丰碑；一个个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热血和生命锤炼出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他们在斗争中表现出了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高超灵活的对敌斗争艺术、艰苦奋斗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甘于无名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这些凝聚成了隐蔽战线精神特质：胜而不骄，败而不馁，受气不叫，有苦不说，舍己救人，冒险犯难，埋头苦干。

毛泽东曾经说过：今后革命胜利了应该给我们情报战线的无名英雄们发一个大大的奖章。很多无名英雄没能盼来这枚奖章就早早地离开了我们。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但他们的功绩永世长存！徐向前曾指出：“我们的党史、军史有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对情报工作反映不够。”近年来，可以看到一些公开出版的反映隐蔽战线的史料、传记，但总的来说还不是很丰富，与隐蔽战线建立的功勋还不相称。这套《隐蔽战线春秋书系》分“传记卷”、“回忆录卷”和“史述卷”，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隐蔽战线的历史和无名英雄的精神。既是对老一辈隐蔽战线英雄的深切怀念和告慰，也可以作为新时代国安干警的教育读本，让一代新人了解历史，传承基因，所以是很有价值的。

（作者为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

|| 前言 ||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党最早的军事领导人。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周恩来于1927年8月1日领导了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1928年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等职。当时中共中央在上海处于秘密状态下工作。他为保卫中央的安全，为联系和指导各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为发展在国民党统治地区的秘密革命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内，他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工作的主要主持者。几十年来，周恩来努力探索并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他在毕生革命生涯中所表现的大智大勇、文韬武略，赢得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情报保卫工作的创始人和卓越领导者，是隐蔽战线的统帅，他为这项事业呕心沥血半个世纪。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曾于四五月间转移武汉，同年八九月间又迁回上海。党的领导机关在敌探监视下活动，随时可能遭到打击和破坏。若不开展隐蔽斗争，就不能保卫自己。根据形势的需要，周恩来总结了以往工作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吸取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惨痛教训，提出建立情报保卫工作的专门机构，以防敌探特务的破坏，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在他直接领导下，1927年开始建立中央特科。1928年11月中央政

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负责这一工作。周恩来借鉴苏联建立“契卡”的经验，对中央特科规定了三项任务和一条原则：打进敌人内部获取情报、筹款、制裁叛徒；但搞侦察工作的专门手段，绝不许在党内进行。同时，周恩来通过实践，将俄国地下党的成功经验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且摒弃了俄国情报工作凌驾于党之上、搞特殊化的一些做法，始终将中央特科置于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之下，使它成为党的战斗堡垒。

由周恩来亲自领导部署，中央特科在国民党专业反共领导机构中拉出第一个反间谍关系，探取敌人破坏我党的阴谋，向党的秘密组织报警；派人打进敌人心脏，深入最高敌探机关，掌握敌人核心机密；营救被捕同志；镇压叛徒。在血腥的白色恐怖下，在与党的生死存亡攸关的紧要关头，保卫了中共中央和各级组织的安全。

周恩来也是我党我军电讯工作的创始人，他直接领导李强研制成功党的第一套收发报机，培训出第一批报务员，建立起第一座无线电台。他还亲自编制了第一本密码，用他的化名“伍豪”命名为“豪密”。1931年3月，任弼时将“豪密”从上海带到中央苏区。两地电讯沟通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上海、任弼时在苏区亲自担任译电工作。随后，在全国各地红军中和各大城市，普遍建立了无线电通讯工作，有力地配合了革命战争，沟通了中共中央和各地党组织的电讯联系。这在党的电讯工作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党的无线电通讯工作从此日益发展，还在上海建立了国际电台，同共产国际也通了报。

“由于中共中央是在敌人统治下的上海从事秘密工作，周围的环境异常险恶。周恩来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领袖，是敌人千方百计追捕的重要目标。他在大革命时期又长期担任公开的领导工作，国民党内有许多人熟识他，处境更加危险。周恩来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却以他的冷静和机智，从容应付，积累起更加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他不停地变换姓名和住址。居住的地点，有时住一个月，有时只住半个月，每换一处就改一次姓名。知道他住处的只有两三个人。由于社会上认识他的人太多，他外出的时间严格限制在清晨5时至7时和晚上7时以后，其余时间除特殊情况外都不

出去。他对上海的街道布局进行过仔细的研究，尽量少走大马路，多穿小弄堂，也不搭乘电车或到公共场所去。他通常装扮成商人，后来又留起了大胡子，所以党内许多人叫他‘胡公’。敌人尽管把他作为极力搜索的重点目标，却始终无法发现他的踪迹。”（《周恩来传》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19—220页）

《孙子兵法·用间篇》说到情报工作的重要和它的领导者应当具备的素质：“故三军之亲，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周恩来以其超凡的才智、机警的才干，创建了我党的情报工作，在领导中央特科工作期间，经历过许多惊心动魄的斗争，在隐蔽战线的对敌斗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一、中央特科的诞生 / 1

没有情报保卫工作就要挨打 / 1

红色情报工作者在武汉初试锋芒 / 3

建立中央特科保卫党组织 / 7

二、一科——特科的“总管家” / 12

设立党的秘密机关 / 13

布置党的会议会场 / 18

营救被捕同志 / 20

三、情报科长“王庸”——陈赓 / 24

陈赓的传奇经历 / 24

牛惠霖医院里的风波 / 27

无所不在的“王先生” / 29

火车上险遇钱大钧 / 34

四、情报战线的英豪 / 37

兵器专家刘鼎 / 37

济世名医柯麟 / 42

隐蔽战线的“福将”陈养山 / 49

血染沙场的陈寿昌 / 53

五、“龙潭三杰” / 57

李克农说：我是党中央的“警卫员” / 58

传奇英雄钱壮飞 / 63

“年纪最轻，才华最高”的胡底 / 67

六、第一个反间谍关系——杨登瀛 / 69

“日本通”杨登瀛 / 69

兰普逊说：巡捕房不希望与杨登瀛以外的人接触 / 72

蒋介石任命的“中央驻沪特派员” / 74

徐恩曾把大案交杨登瀛全权处理 / 76

从敌人营垒“拉出来”的典型 / 78

七、深入龙潭虎穴 / 80

调查科与徐恩曾 / 80

周恩来说：“你们把它拿过来” / 83

抓住徐恩曾的弱点，拿到绝密电码本 / 86

拿他的护照和钱，办我们的情报；

用他的手和枪，除掉我们最恨的警探 / 89

向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打进去”的典型 / 93

八、奉天讲武堂教官——赵唯刚 / 94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两个月参加共产党 / 94

在奉天讲武堂和高等军学研究班 / 97

营救被捕的刘伯刚 / 103

- 兵运工作再遭挫折 / 105
- 一次抢救文件的斗争 / 106
- “九一八”前一个月侦知日军要动手 / 108

九、行动科和“红队” / 110

- “魔术大师化广奇”——顾顺章 / 110
- 令敌胆丧的“打狗队” / 114
- 李一氓笔下的“苏维埃会议” / 119
- 镇压叛徒绝不手软 / 121

十、“红队”利剑出鞘 / 125

- 英国巡捕冲进罗亦农屋门 / 125
- 查找出卖罗亦农的叛徒 / 128
- “残躯何足惜，大敌正当前” / 130
- 叛徒在鞭炮声中毙命 / 132

十一、霞飞路侧的枪声(上) / 134

- 针对周恩来的袭击 / 134
- 武装营救未能奏效 / 140
- 彭湃、杨殷等四烈士英勇就义 / 143

十二、霞飞路侧的枪声(下) / 147

- 穷追叛徒白鑫 / 147
- 叛徒倒毙在“红队”枪口下 / 150
- 镇压叛徒的英雄谭忠余 / 154

十三、营救任弼时、关向应 / 157

两次营救任弼时 / 157

任弼时第二次被捕 / 160

营救关向应 / 162

十四、开拓新局面(上) / 168

纠正了单纯恐怖行动,引向政治斗争轨道 / 168

旷世奇才杨度 / 170

两个国会议员:梅宝玢、胡鄂公 / 176

十五、开拓新局面(中) / 184

贡生——省议员——开明绅士刘少白 / 184

牧师和律师 / 190

向新闻界发展 / 197

十六、开拓新局面(下) / 202

淞沪警备司令部 / 202

“第四号政治密查员” / 203

英、法租界巡捕房 / 208

十七、电讯科长“曾培鸿”——李强 / 211

党的电讯事业创始人李强 / 211

为党造出第一部收发报机 / 214

到香港建立电台 / 217

培训党的第一代报务员 / 220

“划时代的通信革命” / 227

十八、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 / 232

留日电机专家蔡叔厚 / 232

党的第一个报务员张沈川 / 237

留苏专家毛齐华 / 241

“木匠”涂作潮 / 245

十九、扑灭一场特大灾祸——顾顺章叛变前后 / 250

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 / 250

在汉口被捕叛变 / 256

一网打尽“中共中央”阴谋彻底破产 / 260

二十、倾箱倒篋的出卖 / 263

顾顺章出卖了在南京狱中的恽代英 / 263

顾顺章赴香港捕杀蔡和森 / 269

出卖、抓捕向忠发 / 273

出卖鲍君甫(杨登瀛) / 278

二十一、穷凶极恶的捕杀(上) / 281

派特务追捕陈赓 / 281

魔手伸进王根英的娘家 / 297

二十二、穷凶极恶的捕杀(下) / 303

秘密绑架丁玲 / 303

参与暗杀杨杏佛 / 313

二十三、隐蔽、撤退、转移 / 322

中央特委会调整和特科改组 / 322

陈赓、陈养山转移天津 / 325

李强到莫斯科深造 / 333

“龙潭三杰”去中央苏区立新功 / 335

刘鼎撤离一波三折 / 342

周恩来安抵红都瑞金 / 348

二十四、叛徒顾顺章的可耻下场 / 351

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 351

变本加厉的出卖 / 354

写了一本献媚取宠的书 / 361

终被徐恩曾处决 / 364

二十五、《伍豪启事》的出笼与破灭 / 370

伪造的《伍豪启事》出笼 / 370

临时中央为周恩来辟谣 / 373

斩断江青射出的毒箭 / 377

结束语 / 382

后 记 / 389

补 记 / 392

一、中央特科的诞生

没有情报保卫工作就要挨打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后，就处在敌人——先是北洋军阀，后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打杀之下，只能进行“完全非法”的活动。面对严酷的白色恐怖，反动当局的严密搜捕和血腥屠杀，要把国民党统治下广大地区党的组织

保存下来是极其困难的，要使它得到巩固和发展更不容易。这不仅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毅力，而且还须有高超的智慧和比较正确的指导。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是一切军事战略家的用兵之道、取得战争胜利的法宝。《孙子兵法·谋攻篇》说：“知己知彼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者，一胜一负；不知彼，知己，每战必殆。”军事斗争如此，政治斗争也一样。这是一条制胜的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中国共产党的情报保卫工作，是在严酷的阶级斗争中为了防止敌人破坏，保卫党的安全而创建的。建党



大革命时期的周恩来

初期，还不懂得使用情报手段作斗争武器的重要性。由于未能把情报手段作为必要的斗争武器，党在了解敌人和保卫自己方面处于被动地位。遇到敌人的袭击往往措手不及，遭受失败。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非常惧怕中国人民的觉醒和敢于斗争的反抗精神。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传入中国，就被这些压迫人民的敌对势力视为洪水猛兽，共产党和一切进步组织更被他们视为异端。他们派侦探到处侦察监视，派军警到处缉捕，想把革命运动扼杀在萌芽状态。血的教训，历历在目。例如：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为兴亚路76号）李汉俊家里召开。大会进行到最后一天，忽然有一个陌生人闯进会场，说是找人找错了门。当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很机警，问大家认识此人否，大家说不认识，他说一定是密探，赶快离开会场。会议立即中止，代表迅速离开。10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前来搜查了会场。代表们随即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开完最后一天的会议。（当时闯进会场的密探，是法租界巡捕房政治组的探长程子卿。此人是镇江人，1905年入法捕房，至1943年共在这里干了38年。）（薛耕莘：《我与旧上海法租界》，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6辑）

实际上，敌人的监视、缉捕在中国共产党尚未正式成立前就已开始。陈独秀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他为反对北京政府疯狂逮捕上街演讲学生的暴行，6月11日在北京散发其所写的《北京市民宣言》，就遭到逮捕。经多方营救获释后，被迫离开北京转移到上海，由他主编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青年》杂志也随之迁往上海出版。1921年10月，陈独秀当选中共中央局书记（即总书记）不久，他在上海老渔阳里二号的住所，突遭敌探搜查，将在他家议事的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高君曼（陈妻）和他一起抓走。经过多方营救，关押8天后才被罚款保释。

老渔阳里二号是《新青年》及进步书刊的发行处，党组织又常在这里开会、接头，来往人员很多。由于没有经验，把陈独秀安排在这地方住，无异于将中央局的机关暴露给敌人。当时党还处在幼稚阶段，缺乏敌情观念，也没有力量建立情报保卫组织，一旦遇到险情只能暂时“易地革命”，避免损失，

因而继续遭到敌人迫害：1922年春，张国焘在上海成都路住处刚挂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招牌，就被英租界巡捕房搜查、封闭，张国焘被迫逃走。1922年7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党中央创办公开发行的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只出版4期，即遭巡捕房搜查并禁止出版，结果自第6期起被迫从上海迁到北京编印，中央局也被迫同时迁到北京。1923年“二七”罢工失败后，军阀政府加紧摧残革命，北京形势骤然紧张，中央局又被迫迁回上海。不久上海形势恶化，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向导》《新青年》杂志又被迫迁往广州。直到1923年9月，上海形势好转后才又迁回上海……

1924年，国共两党实行第一次合作后，中国共产党一部分党员加入了国民党，以国民党党员的名义进行公开的革命活动。同时又严格分清党内党外关系，凡能公开活动的，尽量利用公开的身份来掩护地下斗争。这样，党开始通过统一战线进行情报保卫工作。1925年春，革命形势迅速好转，党组织领导了全国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这年党领导的“五卅”反帝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罢工、罢课、罢市斗争。有些外国工厂的资本家压制罢工，强令或欺骗工人上工，甚至暗害工会干部和群众。为了保障罢工的进行、保护工人的安全，中共沪西区委、浦东区委和沪东区委领导的工人纠察队，先后镇压了一些凶恶的敌人，稳定了罢工斗争形势，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挑衅。其后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成立了上海工人纠察队，队员有5000人，拥有300条枪，他们抗拒敌人的镇压，同时对付工贼走狗的欺侮。在这些斗争中，工人纠察队显示了强大的力量，并且探索到了加强秘密工作和保卫工作的经验。

然而，周恩来等中央负责同志对情报保卫工作的认识与重视，却是从吸取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惨痛教训后开始的。

红色情报工作者在武汉初试锋芒

1927年3月，周恩来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他是1926年12月离开广州的，到上海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27年2月任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2月23日，中共中央、中共上海区委举行

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周恩来任委员），并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特别军事委员会，准备进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武装起义发动的时候，周恩来担任了总指挥。

3月21日发动的这次武装起义，整个行动由周恩来和罗亦农、何松林（汪寿华）、陈独秀、赵世炎指挥。经过28小时战斗，攻下北洋军阀在上海的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这次起义取得胜利，全靠有组织的产业工人奋勇作战，打败了几千反动军警。这是中国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武装起义胜利的光辉一页。

当上海工人欢庆胜利的时候，蒋介石等率北伐军进入上海，立即从背后向起义的工人阶级捅了一刀，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1日夜到12日清晨，他们先以阴谋诡计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械，13日就开始了疯狂的屠杀和搜捕，大批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倒在血泊里。白崇禧在工人起义胜利时率领北伐军东路军开进上海，即在龙华兵工厂内设立了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委任杨虎为司令。当时任上海国民党政治分会委员的是陈群，他们两个狼狈为奸，杀害共产党人，被人称作“虎狼成群”。据不完全统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三天内，被杀害者300多人，被逮捕者500多人，5000多人流亡失踪。接着各地也相继发生惨案。仅广州“四一五”惨案中，就有2100多名共产党员和工人惨遭杀害。

整个中华大地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处于半公开状态。

周恩来在4月14日转移到吴淞附近徐家宅一处工人住家的小阁楼上继续工作。他起草了一份电报，与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尹宽联名致电中央，主张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但是，这一建议未被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中共总书记陈独秀所采纳。

当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时，党和人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袭击，致使革命遭到严重的损失。当此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武汉，并于4月下旬在汉口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但他在广东领导军事工作和在上海领导第三次工人起义中表现出来的才能，已得到全党的了解和承认。在这次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

委员。在中央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27年5月下旬，周恩来从上海秘密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一到武汉，他就参加了中共中央的工作。5月22日，他列席了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25日，又列席第十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他任中央军事部长，并规定军事部长在必要时参加常委会议。29日，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央核心领导。此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他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这个时候，革命遭受失败的惨痛教训，引起周恩来和许多负责中央工作的同志的重视。党在革命的实践中，特别是在革命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开始懂得：和强大的敌人作斗争，必须了解敌人，了解它的军事、政治动向，才能准确有效地攻击敌人、战胜敌人。周恩来领导军事部后，即在军事部下面成立了以情报、保卫工作为着重点的特务科。当时军事部的任务特别繁重，它要筹划部署中央全面的军事工作，时刻准备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军事斗争。

新建立的情报、保卫工作，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站在敌我军事政治斗争的第一线，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当时在武汉中央军事部（以后通称“中央军委”）参与情报、保卫工作的李强，曾在1981年10月谈到这段经历。他说：“在‘四一二’后我到武汉，到了武汉中央军委。中央军委那时的书记是周恩来同志，军委下面有两个长：一个参谋处，参谋长现在还在，是聂荣臻同志；秘书长王一飞同志，牺牲了。另外还有两个科：一个科叫组织科，组织科长是欧阳钦同志；后来成立一个特务科（又称中央军委特科），负责人是顾顺章，他在五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我当时在特务科，特务科下面分四个股：一个保卫股，负责保卫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机关的安全。譬如说保卫周恩来同志，保卫周恩来的那个同志现在还活着，在上海，叫杨福林，今年84岁，在上海普陀区当过副区长，现在退休了。我去年找到过他。另外还有保卫8个重要领导人以及鲍罗廷（保卫他的有60个人）的任务。保卫股长也是上海去的，叫李剑如。那个时候，保卫股的兵不算兵，又不是警察，所有的人都穿一身三个口袋的学生装。另一个叫情报股，搞情报，情报股每天在武汉搜集一般所能知道的情况。情报股长是董胖子，可能叫董醒吾或董省五。另外一个特务股，负责镇压叛徒特务，兼办